

谭嗣同

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

贾维

著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/贾维著. —长沙:湖南大学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 7-81053-692-3

I. 谭... II. 贾... III. ①谭嗣同(1865~1898)—人物研究 ②知识分子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 IV. ①B254.5
②D691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1226 号

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

Tansitong Yu Wanqing Shiren Jiaowang Yanjiu

贾 维 著

-
-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责任编辑 | 肖立生 |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特约编辑 | 周小喜 |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装帧设计 | 吴颢辉 |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出版发行 | 湖南大学出版社 | | |
| | |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| 邮码 410082 | |
| | | 电话 0731-8821691 | 0731-8821594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经 销 | 湖南省新华书店 |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印 装 |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邵阳) | | |
-

-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开本 | 880×1230 32开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印张 | 13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字数 | 336千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版次 | 2004年2月第1版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|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印数 | 1~4 000册 | | | | |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书号 | ISBN 7-81053-692-3/B·20 | | | | | |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| 定价 | 28.00元 | | | | | | |
-

(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, 请向承印厂调换)

总 序

朱汉民

光绪二十七年，清廷下诏全国教育改制，废书院、兴学堂，延续千年之久、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制度被废除，而其中一部分书院则改制为近代学堂。曾在中国书院史上一直极富盛名、并且是“天下四大书院”之一的岳麓书院，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。辛亥革命后，经过一段学制的变更，至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。这样，一所有着近千年办学历史的古老书院，终于完成其近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，成为今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一所全国重点大学。

然而，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并没有终止，这所办学悠久的古老学府在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。一方面，因为岳麓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，其遗址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，在湖南大学的主持下修复原貌并对外开放，现在来此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，它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寻访中国文化的重要目的地。另一方面，岳麓书院在修复的同时又逐步恢复其培养人才、学术研究的功能，它已经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人文学科的教学、研究基地，纳入到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体系中，并获得历史、哲学等人文学科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权。所以，许许多多来岳麓书院视察、访问、考察的政界要人、学界名流，在高度赞扬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价值的同时，也充分肯定它作为活的文化生命的现代意义。

岳麓书院曾经有过900多年办学历史及活的文化生命。在历经种种社会变局、政治动荡之后，岳麓书院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弦歌不绝，是因为她承担着使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文化创新、文化积

累、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。在社会变革、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，岳麓书院总是立身于时代的前头，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基地；总是通过不断地著书、刻书、藏书，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累积宝贵的精神财富；总是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士人，从而完成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。

正如人们所看到的，今天的岳麓书院作为活的文化生命，一如既往，依旧以中华文化的创新、积累、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。在这所古老的庭院中，现代学人仍在参加一次一次的学术聚会，仍在聆听一场一场的学术演讲，仍在撰写、出版一部一部的学术专著，仍在毕业一届一届的读书人。这一切，都在说明一个事实：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延续在今天，而且活出了新的意义。

我们编辑、出版这套《岳麓书院学术文库》，其主要宗旨，就是继承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，继续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尽绵薄之力。希望本文库能够传承古代书院的文化创造、文化积累、文化传播等功能，为现代学术文化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。

当然，当代学术文化，群星灿烂。我们只能根据岳麓书院在学科建设、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研究方向及特色，确立一些研究系列。本《文库》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是湖湘文化研究系列。我们还将继续推出其他多个系列。本《文库》的作者队伍，除岳麓书院的在职教学研究人员、研究生以及来此讲学的专家学者外，还包括一些在本系列的研究中有学术见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。希望大家来共创今日岳麓书院的学术繁荣。

目

次

总序

序一

序二

自序

1 晚清浏阳之学及其士人群体

- 一、近代湘学之特点 1
- 二、晚清浏阳之学 7
- 三、蔚庐先生刘人熙 18
- 四、辨县先生欧阳中鹄 28
- 五、欧、刘之异同及其影响 34

2 谭嗣同的家世与早年

- 一、浏阳梅花巷谭氏 45
- 二、父亲谭继洵 51
- 三、家庭变故 64
- 四、早年生活 72
- 五、科举功名之途 80

3 谭嗣同的早期文注

- 一、“受读辨县、大国之门” 98
- 二、“讲霸王经世之略” 104
- 三、“薄上京师，请业蔚庐” 111
- 四、武昌时期 120

谭嗣同与浏阳士人的维新活动

- 一、甲午战败，创巨痛深 137
- 二、师生共倡变法 145
- 三、围绕《兴算学议》的争论 157
- 四、闻名湖湘之始 162
- 五、与湘、鄂维新群体的交往 165

5

与京沪浙粤维新人士的交往

- 一、京师维新人士 180
- 二、沪上维新人士 188
- 三、南京、天津维新人士 197
- 四、冲决网罗之学 204
- 五、湘鄂维新群体的活动 221
- 六、湘、粤合流 239

6

在维新运动高潮之中

- 一、官绅合作 263
- 二、新旧之争 285
- 三、师生分道扬镳 294
- 四、联络秘密会党之活动 ... 303
- 五、戊戌北上及遇难 313

7

尾 声

- 一、身后哀荣 349
- 二、师友评说 356
- 三、历史影响 363

结束语 晚清知识分子演变的历史缩影

..... 371

参考文献 375



谭嗣同的早期交往

谭嗣同自少年时期在京师从欧阳中鹄受业，即开始了他与浏阳士人群体的交往，这个过程持续了23年，直至其生命的结束。这里所说的“早期交往”，是指从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谭嗣同以欧阳为师开始，到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甲午战争爆发之前，即谭嗣同10岁至30岁这20年之间的交往活动。这20年，也是谭嗣同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内学习和探索，并开始接触西学，由此形成自己学术思想的重要时期。谭嗣同在《报刘淞芙书》中简要地叙述了自己这20年的经历：

“嗣同少稟昏惰，长益椎鲁，幸承家训，不即顽废。然而家更多难，弱涕坐零。身役四方，车轮无角。虽受读瓣姜大圉之门，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。东游江海，中郎之椽竹常携；西极天山，景宗之饿鸱不释。飞土逐肉，掉鞅从禽。目营浩罕所屯，志弛伊吾以北。穹天泱泱，矢音敕勒之川；斗酒纵横，抵掌《游侠》之传。戊己校尉，椎牛相迎；河西少年，擎拳识面。于时方为驰骋不羁之文，讲霸王经世之略。墨鬲盾鼻，诡辩澜飞；米聚秦山，奇策纷出。狂瞽不思，言之腾笑。以为遂足以究天人之奥，据上游之势矣。既而薄上京师，请业蔚庐，始识永嘉之浅中弱植，俶睹横渠之深思果力，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，缅乡贤朱先生谥然之致，又有王信余、陈曼秋、贝元徵以为友。困而求亨，翻然改图，愧弄戟多少之讥，冀折节勤学之效。如何不淑，

变生海外。原隰悼痛，跼踉来归。基础遂隳，何期云构。自顷以来，精力荼于当年，锋锐顿于一蹶。子桓曾逝者之唏，公干卧幽忧之疾。后得复事瓣姜，续欢王、贝。益以涂君质初，相勸亟勤；他州豪俊，存问不乏。”①

这是谭嗣同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一段重要文字。根据其自述，我们可以将谭氏的早期交往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：“受读瓣姜、大围之门”（10至17岁）；第二阶段：“讲霸王经世之略”（18至25岁）；第三阶段：“薄上京师，请业蔚庐”（25岁）；第四阶段：武昌时期（26至30岁），此时浏阳士人聚会武昌，盛极一时，谭得以“复事瓣姜，续欢王、贝”，他又称为“儒林硕彦，映照一时”。下面我们将依次分别叙述之。

一、“受读瓣姜、大围之门”

在浏阳三先生中，以欧阳中鹄与谭嗣同的师生关系开始最早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欧阳中鹄赴京，住浏阳会馆。会试报罢后，即为谭继洵“主其家”，并教读其子嗣襄、嗣同，当时欧阳25岁，嗣同方10岁。这一学习阶段持续了将近四年时间，到光绪四年（1878）春，嗣同随其父远赴秦州而告一段落。

欧、谭师生关系开始之日，也正是谭嗣同生活悲剧发生之时。欧阳中鹄亲眼目睹了整个悲剧的过程，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少年寄予了无限的同

夫子大人函在京晤復一箋交至北萍
已漢口之素九成寄時已極然出
京撥沈富之殊不極意隨於六月
十八日出京廿九日到京與翁洽分
伴獨入宦中矣計北遊迄此幾五
箇月時不為不久地不為不遠見人
不為不多於身心宜有長進又慮
石親
燕洲的入於依身而不免用叔保轉好

谭嗣同致欧阳忠鹄书

情，他常对人说：“嗣同虽生为公子，而危苦甚于齐民，天下伤心之人，遂有天下伤心之事。”^② 欧阳尽其所能给予帮助，以减轻其痛苦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欧阳中鹄都是嗣同的安慰和依靠，一往情深地关怀着他的成长。嗣同也在老师那里得到了家庭所得不到的温暖，藉以度过艰难的岁月。欧、谭之间，虽为师生，却情同父子。很多年以后，欧阳中鹄回忆说：“谭生受厄家庭，毫无生人之趣。尝切戒以勿使血气用事，充积至诚，不下数百次，故其心悦诚服，亦步亦趋，视余犹父者二十余年。”^③ 嗣同一直对老师的“片纸单词，珍若拱璧”。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师生关系，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。

谭嗣同与涂启先的师生关系始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。是年秋，嗣同由秦州返抵浏阳，即与仲兄嗣襄一起从涂启先读书。这次学习持续了将近三年，到光绪八年（1882）春嗣同重返秦州而结束。由此可见，嗣同“受读瓣姜、大围之门”，前后共七年时间，在其早年学习过程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。

经史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，也是当时学童学习的重点。欧阳中鹄和涂启先“经义湛深”，在他们的指导下，嗣同兄弟开始攻读被称为“五经”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，以及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等史籍，我们可以在《谭嗣同全集》中看到“少受《易》，因及三《礼》，于《春秋》独不喜言例”的记载。^④ 当时的教学方法强调背诵，老师则为指示大意，这从嗣襄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：“教以《诗》《书》，初不在意，及责其默诵，朗朗不失。为陈大旨，略指示，即领悟。”^⑤ 在两位老师的严格要求下，嗣同在中国传统学问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故《谭嗣同年谱》说：“五经诸史之教导，欧阳师、涂师实启沃之。”^⑥

嗣同学习经学，注意分析章句和音训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自束发治经学，好疏析章句，而不知拘于虚也。”又说：“蚤为旧学所溺，或笥订褻积，役于音训。”^⑦ 他重视清代学术，认为“经学莫盛于国朝，不

知史学、道学、经济、辞章以及金石、小学，无不超越前代……故学论学亦学今学而已”^⑧。对于儒家经典，嗣同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所选择。“《仪礼》苦其难读，未尝究心。”^⑨他比较重视《周易》《周礼》和《春秋》。认为《易》者言变，《礼》者不变，两者都体现在《春秋左传》中，治学应当“本诸《易》以究天人古今之变，而一折衷于礼”。他说：“夫《易》，言变者也；《礼》，不变者也。变者周流六虚，不可为典要，所谓新意变例，归趣非例也。故笔削微显，不惟其文惟其道，圣人之《春秋》以之。不变者，质文损益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所谓发凡正例也。故科律严谨，皆足以远示来裔，史臣之例以之。”^⑩

谭嗣同对西晋杜预（元凯）《春秋释例》一书颇感兴趣，自称“鄙性所嗜，尤在杜元凯之《春秋释例》”^⑪。该书为古文经学中春秋左传学的重镇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其评价很高：“《春秋》以《左传》为根本，《左传》以杜解（指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》）为门径，《集解》又以是书为羽翼。缘是以求笔削之旨，亦可云考古之津梁，穷经之渊藪矣。”^⑫嗣同认为杜预此书中所谓“义例”，并非孔子“褒贬之精意所存”，而是属于“史臣之通法”。根据这些“义例”，就可以“法具而史明，史明而礼起”。他不满足于该书“条目简疏，又殂夺不完，不足规周公制作之全，而给后世纪传之用”，因而有编写《史例》的计划。其编写方法为：“欲发其例，必先稽以小学，著其指事类情之所在，然后紬绎史籍，徵信于三代两汉之书；于《礼》得其体，于《易》得其通，史学固然，凡学莫不然也。”^⑬《史例》一书后来并未写成，但从上述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就其治学途径而言，谭嗣同仍然属于古文经学的系统。谭嗣同十分重视《周礼》，他认为：“古法可考者，《六经》尚矣，而其至实之法，要莫详于《周礼》。《周礼》，周公以之致太平而宾服四夷者也。”所以他注重研究《周礼》的典章制度，以了解“先王之法度”，从中体会“周公立法之善”。在他看来，井田、封建、世禄、宗法，“此数者，周公藉以立法之质地也。”^⑭其中，又以宗法为关键。

“王者封建诸政，必依乎宗法，非宗法依封建。封建可废，宗法不可废。宗法者，王政之精微而博大又易易者也。”¹⁵谭嗣同的经学观点，是在其治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，对其后来思想学术的演变有一定的影响。

谭嗣同此时的学习已显示出自己的特点，他不限于阅读儒家典籍，而喜欢广泛阅览，涉及群书，尤其是那些被正统儒者称为“杂家”的书籍，使其知识吸收具有“博杂”的特征。《庄子》《墨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法言》《论衡》《潜夫论》《世说新语》《抱朴子》等都是他特别爱读的书籍。谭嗣同的自学能力非常突出，据当时一位同学回忆：“时值与公（指嗣同）同事涂师，公幼年读书，十行俱下，我辈均望尘莫及。时公方十三岁，年实相若也。”又据曾任李兴锐家塾师的浏阳老儒卜鉴（心湖）回忆：“一日公（指嗣同）至李氏登楼观书，速良惊人。事后举其所观者相询，公一一举其要点相答，其记忆力可佩。”¹⁶此类传说在浏阳流传很多。嗣同读书不喜人云亦云，他对书籍和作者往往有独立的理解和判断，精辟新颖，发人深省。他论庄子：“于道宏大而辟，深闳而肆”；论王充：“卓然不惑，亦可谓豪杰之士哉！”批注《王勃（子安）集》云：“《滕王阁序》流传千古，不知子安其俗在骨，譬如纨绔公子与谢东山、羊叔子风流有别。”¹⁷说明他读书，与一般流俗腐儒迥异。

在谭嗣同的学习中，辞章之学是一个重要内容。谭嗣同曾经这样概述自己学文的过程：“十五学诗，二十学文”¹⁸。他在文学上下过很大气力，声称自己“性乐文史”而“笃于文”，并以其文“苍郁峭蒨”的风格而感到自豪。“嗣同不慧……华藻宫商，辱为雕虫。握槊则为之脱腕，雒诵则为之气尽，夫亦可谓笃于文矣。往年罗穆倩谓嗣同：‘子通眉，必多幽摯之思。’饶仙槎则亦谓：‘惨淡精锐，吾惟见子。’故偶然造述，时复黝然深窅，而精光激射，亦颇不乏苍郁之概，峭蒨之致。”言为心声，文若其人，谭嗣同的诗文感情深沉，哀婉动人。“其

于哀乐，煎情锻思，昼夜十反。一丝潜引，无首无尾，溶裔长怀，若弥万仞而莫之竟。顾纤徐愈婉，斯激出弥劲，忽便任之，遽有慄疾廉悍恣睢不可控制之观。孰使令之欤？由其性情与所遭遇在焉。”^⑩

在文章方面，清代文坛桐城、阳湖两大文派，分别通过涂启先和欧阳中鹄，而给谭嗣同以不同的影响。涂启先“文法桐城”，“能为桐城古文，义法谨严，操笔立就”。嗣同从其读书，在一个时期内，也深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，其作文竭力模仿桐城古文的风格，达到了非常相似的地步。他回忆说：“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，刻意规之数年，久自以为似矣；出示人，亦以为似。”与涂启先不同，欧阳中鹄则“好骈俪之文”，尤“雅好蔡中郎（邕）文”。在其影响下，谭嗣同逐步脱离桐城派的窠臼，文风为之一变。“诵书偶多，广识当世淹通转博壹之士，稍稍自惭，即又无以自达。或授以魏晋间文，乃大喜，时时籀绎，益笃嗜之。由是上溯秦汉，下循六朝，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，子云所以独辽辽焉。”^⑪谭嗣同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其《廖天一阁文集》中不乏近代散文名篇。

谭嗣同不满于桐城古文以所谓“义法”“束迫天下之人才”，导致文风狭隘雷同，平淡而无生气，因而喜爱“沉博绝丽之文”。对于骈、散之争，他反对骈、散对立，主张骈、散合一，认为“骈、散分途，而文乃益衰”，提出“所谓骈文，非四六排偶之谓也，体例气息之谓也。”^⑫在模仿和创新问题上，他主张“独往独来，不因人热”，反对“章摹句效，终身役于古人”。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看法，也与言必称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大相径庭，菲薄欧（阳修）、曾（巩）、归（有光）、方（苞），而推崇“汪（中）、魏（源）、龚（自珍）、王（闾运）始是才”。谭嗣同说：“文至唐已少替，宋后几绝。国朝衡阳王子，膺五百之运，发斯道之光，出其余绪，尤当空绝千古。下此若魏默深、龚定庵、王壬秋，皆能独往独来，不因人热。其余则章摹句效，终身役于古人而已。至于汪容甫，世所称骈文家，然高者直逼魏、晋，又

乌得仅目曰骈文哉？自欧、曾、归、方以来，凡为八家者，始得谓之古文，虽汉、魏亦鄙为骈俪，狭为范以束迫天下之人才，千夫秉笔，若出一手，使无方者有方，而无体者有体，其归卒与时文律赋之雕琢声律，墨守章句，局促辕下而不敢放辔驰骋者无异。于是鸿文硕学，耻其所为，而不欲受其束迫，遂甘自绝于古文，而总括三代、两汉，咸被以骈文之目，以接八家之古文于不足道。为八家者，不深观其所以，而徒幸其不与争古文之名，遂亦曰此骈文云尔。呜呼！骈散分途，而文乃益衰。则虽骏发若恽子居（恽敬），尚未能蠲除习气，其他又何道哉！”²²

清代诗派，分为魏晋、唐、宋三大支。谭嗣同重视魏晋和唐诗，对宋诗则评价较低。他认为：“海内诗派，眉山（苏轼）、江西（黄庭坚、陈师道）而后，渐即横流。梅村（吴伟业）、新城（王士禛）出，救以清新，后乃流为浮滑。”²³他对近世湖南诗人评价颇高，有“一时诗思落湖南”之语，对王闾运（湘绮）尤为推崇备至。“若夫高华凝重，赋丽以则，擎孤掌以障奔流，上飞云而遏细响，四杰不作，舍湘绮其谁与归？”称其“哀感顽艳，更复执玩，不忍释手。湘中灵怪之气，笃钟一支笔。”²⁴嗣同本人学诗，由唐诗而及六朝。他自道学诗经历和其中甘苦：“嗣同于韵语，初亦从长吉（李贺）、飞卿（温庭筠）入手，旋转而太白（李白），又转而六朝。近又欲从事玉溪（李商隐），特苦不能丰腴。大抵能浮而不能沉，能辟而不能翕。拔起千仞，高唱入云，瑕隙尚不易见。迨至转调旋宫，陡然入破，便绷弦欲绝，吹竹欲裂，卒迫卞隘，不能自举其声，不得已而强之，则血涌筋粗，百脉沸腾，岌乎无以为继。此中得失，惟自己知之最审，道之最切。”²⁵下录嗣同七律《夜成》一首，以见其早年诗风和怀抱：“苦月霜林微有阴，镫寒欲雪夜钟深。此时危坐管宁榻，抱膝乃为《梁父吟》。斗酒纵横天下事，名山风雨百年心。摊书兀兀了无睡，起听五更孤角沈。”²⁶

在学与文（诗）的关系上，谭嗣同重视学的作用，特别强调经术

有助于诗文。在他看来，陶渊明诗之所以多“中正和平”之音，乃其“涵养所至，经术之效”。他曾提出：“学诗宜穷经，方不终身囿于词人。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他推崇其老师欧阳中鹄和刘人熙的诗。“同县蔚庐、瓣姜两夫子，实能出《风》入《雅》，振前贤未坠之绪。瓣姜先生，深自矜惜，不欲以此皮肤粗迹表暴于人，故传抄未广。以愚观之，经义湛深，彭泽后未尝有也。蔚庐先生固稍逊，然称心而言，绝无依傍，一唱三叹，局度雍容，如离高山而履平地，如谢干戈而讲揖让，宽兮绰兮，适肖其胸中之所存，其《翠华》《黄屋》《明堂》《重器》诸篇，非学穷万卷，贯彻天人，乌能道其一字？我辈兀兀雕镌声律，始终无以企之矣。”^{②7}

在前后七年时间内，欧阳中鹄和涂启先与嗣同兄弟朝夕相处，答疑解惑，循循善诱，为之打下了传统学问的基础。他们强调立身处世，特别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道德教育，对其不足之处，常予以诚恳规劝和直言批评，使嗣同兄弟心悦诚服。嗣襄小时十分顽皮，后经欧阳中鹄教导，行为举止大为改观。据欧阳中鹄称：“陆润庠对策第一之岁，光禄公令（嗣襄）受业门下，观听有移，遽自戢敛，以古方今，殆周处之遇二陆也。”^{②8}欧、涂都强调经世致用，注重实践，这对嗣同兄弟养成关心国家大事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志趣和抱负，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。然而，嗣同当时毕竟年幼，对于许多高深问题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，所以他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：“虽受读瓣姜、大围之门，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。”

二、“讲霸王经世之略”

“游侠”形象很早就对谭嗣同产生了吸引力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游侠是最富传奇色彩的社会群体，“夫侠者，盖非常之人也。”而在文化意义上，它又具有与儒者相对立的形象。“儒侠对立，若分泾渭”；“文者

谓之儒，武者谓之侠。儒重名誉，侠重意气。”^⑳嗣同从小就爱读《史记》中的《游侠列传》和《刺客列传》，司马迁笔下的游侠、刺客，如荆轲、聂政等人，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即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”，具有十分感人的力量。游侠慕义感分，重气轻死，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，凡义之所在，即义无反顾的精神，千载之下，激起了少年谭嗣同的强烈共鸣。他在13岁时写下了一副对联：“惟将侠气留天地，别有狂名自古今”；18岁时又作《望海潮》词自题小照云：“曾经沧海，又来沙漠，四千里外关河”；“拔剑欲高歌，有几根侠骨，禁得揉搓？”^㉑表达了自己重侠轻儒的志趣。他倾慕古之游侠“带剑行游，悲歌叱咤”的非凡气概，对“儒者轻诋游侠”嗤之以鼻，认为游侠见义勇为的高尚人格，给人以鼓舞和力量，“非此益无以自振拔”^㉒。嗣同从游侠身上汲取了积极的力量，“艰难困厄，一不以关其怀”，养成了其勇往直前，豪迈不羁的性格。任侠精神对嗣同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在其后来的许多活动中，我们都还可以隐约看出这种被称为“天下奇男子”的侠者作风。

侠者的尚武精神有其表现形式和生活基础，决非终日埋首书斋的儒生所能比拟。嗣同少年时期就喜爱舞刀击剑，“弱娴技击，身手尚便；长弄弧矢，尤乐驰骋”，并批评书生轻视武术是“自文其柔弱不武之短”。他喜欢佩带刀剑，自称“余有双剑，一曰麟角，一曰凤距”。后来又拜黄凤岐（方舟）为师，学习击剑和单刀。谭赠黄氏语云：“曾受双戟单刀，长于葛洪者剑”^㉓，在武术方面有一定造诣。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先生，就曾亲见谭“蹲在地上，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，一翻身站起来，那两个人都跌一跤”^㉔。

嗣同随父亲远赴秦陇后，西北地区为其任侠尚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。秦陇地区山川浩瀚，民风粗犷剽悍，尚武之风由来已久。在谭嗣同笔下，秦陇岁月充满了青年人特有的壮烈情怀与豪迈气概。“目营浩罕所屯，志弛伊吾以北。穹天决滌，矢音敕勒之川；斗酒纵横，

抵掌《游侠》之传。戊己校尉，椎牛相迎；河西少年，擎拳识面。”³⁴ 一个特殊的条件使嗣同兄弟有机会接触军旅生活。巩秦阶道为“整饬兵备道”，道员有权节制所辖境内之都司、守备、千总、把总等武官，是地方的文武长官。继洵时常外出巡视武备情况，嗣同有时也随同前往。在嗣同《三十自纪》中就有光绪八年夏“从行县伏羌”的记载。当时谭继洵的宾客刘云田出赞安定（今甘肃定西县）防军，安定地近渭水源头，为陇中军事重地。嗣同兄弟常去其处，与士卒一同出巡打猎。嗣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：

“安定防军，隶大人部。嗣同间至军，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，设酒饌军乐，陈百戏。嗣同一不顾，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，时私出近塞，遇西北风大作，沙石击人，如中强弩。明驼咿嘎，与鸣雁嗥狼互答。臂鹰腰弓矢，从百十健儿，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，大呼疾驰，争先逐猛兽。夜则支幕沙上，椎髻箕踞，刲黄羊血，杂雪而咽。拨琵琶，引吭作秦声。或据服匿，群相饮博，欢呼达旦。”³⁵

“嗣同弱娴技击，身手尚便，长弄弧矢，尤乐驰骋。往客河西，尝于隆冬朔雪，挟一骑兵，间道疾驶，凡七昼夜，行千六百里。岩谷阻深，都无人迹，载饥载渴，斧冰作糜。比达，髀肉狼藉，濡染禪裆。此同辈所目骇神战，而嗣同殊不觉。”³⁶

嗣同在当时曾照一相片，因技术不高而显得模糊，画面上“旌旗行行，百余健儿罗立，公立其中”³⁷。谭嗣同出生于北京，13岁返回浏阳，14岁远赴秦陇，此后又多次往来于大江南北，足迹几遍半个中国。其行程“合数都八万余里，引而长之，堪绕地球一周。”在广泛的游历中，考察风土人情，大大丰富了其阅历。目睹民生之艰难，社会之弊病，都引起他的关切，发出了“风景不殊，山河顿异；城郭犹是，人民复非”的感叹。这种出自内心的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，伴随了谭嗣同一生。从嗣同兄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，不难看出他们当时“少年盛气，凌厉无前”的精神风貌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与嗣同兄弟这